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2018年第1期·总第16辑

16



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2018年第1期·总第16辑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崔继新 高华梓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16/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01-019557-5

I. ①当… II. ①复…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现代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 IV. ①A81②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103 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DANGDAI GUOWAI MAKESI ZHUYI PINGLUN

2018 年第 1 期·总第 16 辑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7-01-019557-5 定价:7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13)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Wu Xiaoming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Wang Xingfu Zou Shipeng

Edited by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Published by

Renmin Press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Tony Andréani[法]	Jacques Bidet[法]
Iring Fetscher[德]	Agnes Heller[匈]
F.R.Jameson[美]	Georges Labica[法]
Francette Lazard[法]	Michael Lowy[法]
David McLellan[英]	Juergen Habermas[德]
Bertell Ollman[美]	John E.Roemer[美]
John Rosenthal[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庆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目 录

一、纪念马克思诞生 200 周年专辑

- 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现代性问题 [加]哈罗德·马 (3)
- 黑格尔、海涅与马克思
- 青年马克思与康德式伦理学 [美]卡因 (23)
- 马克思的早期政治作品 [美]约瑟夫·奥马利 (50)
- 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德]卢格 (70)
- 马克思与《法哲学》..... [法]魏尔 (95)
- 散议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英]伯尔基 (107)
- 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与马克思的早年批判 [美]伊尔廷 (135)
- 黑格尔在何种意义上是反民主的 康 翟 (164)
- 马克思对黑格尔财产权理论的批判和超越 张守奎 (178)
-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的扬弃及其
哲学史意义 郝 戈 张继栋 (199)
- 以《巴黎手稿》为中心
- 从传统的公私对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张 寅 (217)
- 马克思“价值形态说”的近康德阐释 徐艳如 (231)
- 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评述
- 列宁革命政治的哲学思想 伍 洋 (244)
- 以战争的辩证法为视角
- 国外有关毛泽东思想之传统文化渊源研究综述 武文超 (258)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

- 民主“无断裂”地扩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 张晓兰 (275)
- 伯恩斯坦有关民主道路思想的当代审视
-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解释 孟 飞 (287)
- 隐匿的对话:韦伯现代性视域中的卢卡奇与施米特 高 雪 (300)
- 《巴黎手稿》中“第二自然”与“似自然性”的张力 宋一帆 (315)
- 兼评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 马克思主义与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之比较 王小莉 金瑶梅 (335)
- 作为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郝春鹏 (349)
- 雷蒙·阿隆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阐释
- 重新理解使用价值 冉 璐 (366)
- 对鲍德里亚形而上学的批判

三、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研究专题

- 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流与当代视野 梁冰洋 (387)
- 走向“大众—民主召询” 张 炯 (405)
- 厄内斯托·拉克劳早期民粹主义思想研究
- 很高兴见证民意的涌现 张子岳 (419)
- 朱蒂斯·巴特勒访谈
- 主要论文的英文目录及提要 (428)

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现代性问题

——兼论“德国革命”问题

作者：[德] 施密特 著 李 楠 译

一、纪念马克思诞生 200 周年专辑 <<<

1818年3月18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特里尔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莱茵省特里尔的高级司法官员。马克思在特里尔度过了他的童年。1830年，他进入勃朗根中学。1835年，他进入特里尔大学。184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43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45年，他进入布鲁塞尔大学。184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4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5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5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5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5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5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5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5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5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5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5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6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6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6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6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6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6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6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6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6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6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7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7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7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7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7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7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7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7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7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7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8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8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8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8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8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8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8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8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8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8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9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9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9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9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9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9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9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9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89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89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0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0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0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0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0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0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0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0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0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0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1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1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1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1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1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1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1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1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1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1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2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2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2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2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2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2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2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2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2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2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3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3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3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3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3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3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3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3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3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3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4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4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4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4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4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4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4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4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4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4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5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5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5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5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5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5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5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5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5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5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6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6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6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6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6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6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6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6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6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6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7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7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7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7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7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7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7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7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7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7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8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8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8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8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8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8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8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8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8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8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9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9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9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9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9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9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9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9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199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199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0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0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0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0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0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0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0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0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0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0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1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1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1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1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1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1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16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17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1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19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20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21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22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23年，他进入柏林大学。2024年，他进入巴黎大学。2025年，他进入柏林大学。

关键词：现代性 法国大革命 德国革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现代性”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现代性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革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革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

马克思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现代性”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现代性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革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革的。现代性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

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现代性问题

——黑格尔、海涅与马克思*

[加]哈罗德·马 著 姚 远 译

摘要:本文考察如下努力的演化,即把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德国新文化认同纳入法国大革命所定义的一般现代性话语。黑格尔、海涅和马克思的关键作品表明这个自始困难的计划在 19 世纪上半叶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从黑格尔到海涅再到马克思,对于德国满足现代性新标准的能力越来越忧虑,对于德国文化的造诣越来越怀疑。让德国新文化认同与公认的法国大革命现代性联合的计划,到 19 世纪中叶的时候破产了。而随着它的破产,该计划悖理地导致了它最初旨在预防的结论:德国对现代性的抵抗是深层的、倔强的。

关键词:现代性 法国大革命 德国文化

18 世纪末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变动不居。一些人对于大革命的意图和前景立即表示质疑。歌德表现出怀疑

* 译自 Harold Ma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German Modernity: Hegel, Heine, and Marx", i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50, 1990, pp. 3-20. 本译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FX161)的阶段性成果。

的保留态度;席勒对大革命缔造自由社会的能力有所疑虑。^① 其他人一开始为大革命欢呼雀跃,但随着大革命催生出战争、弑君和雅各宾派专政,他们旋即大彻大悟。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最初的诗情颂扬让位于后来的失落幻灭。^② 根茨(Gentz)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1789年时为大革命摇旗呐喊,到了1792年则把大革命批驳得体无完肤。^③

但即便不是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是一开始或者始终就对大革命表示同情,但的确有不少人视其为崭新优越时代之开端。^④ 而且,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人后来对大革命的暴力和威权主义痛心疾首,但包括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内的一批显赫人士依然坚持自己对于大革命初始动因的理解。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大革命是令人欢欣的、不可逆转的历史突破。^⑤

按照黑格尔的解读,大革命荡涤了那一堆乱糟糟的陈旧社会政治制度,并使得欧洲先进的道德和政治趋势获得具体表现形式。在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贵族特权和专断皇权,代之以社会平等与立宪代议制政府。^⑥

① 有关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的总体点评,参见 Jacques Droz, *L'Allemagn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49; Jürgen Voss, *Deutschland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Munich: Artemis Verlag, 1983; Maurice Boucher, *La Révolution de 1789 vue par les écrivains allemands se contemporains*, Paris: M. Didier, 1954; G.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F. Cass, 1965; Horst Günther, e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Berichte und Deutungen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und Historiker*, Frankfurt: Deutscher Classiker Verlag, 1985; Alfred Stem, *Der Einfluss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auf das deutsche Geistesleben*, Stuttgart: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928. 对歌德和席勒的论述特别参见 Stern 129-144; Gooch 175-207, 214-229; and Droz 172-186, 207-320。

② Gooch 119-126; Rudolf Vierhaus, "Sie und nicht Wir": *Deutsche Urteile über den Ausbruch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in Voss, 1-2.

③ Gooch 91-103; Droz 371-392.

④ 参见注释1中所援引的那些总体点评,尤其参见 Stern 3-16;亦参见 Vierhaus 1-15。

⑤ 关于康特,参见 Gooch 126-282;关于费希特,参见 Gooch 283-295;关于黑格尔,见下文。

⑥ G.W.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pp. 446-447. 以下引证时采用 PH 加页码的缩略形式。

大革命随着拿破仑的南征北战进入中欧地区,推翻了一个油尽灯枯的帝国以及封建特权和奴役的残渣余孽,并帮助建立起理性的法典、财产自由和人格自由以及政府对人民的平等对待(PH 456)。

鉴于大革命扫除了社会平等和立宪政府的传统绊脚石,德国知识分子会把它视为(往小的方面讲)启蒙的实现以及(往大的方面讲)无羁理性的成就。^① 或者如黑格尔在讲授历史哲学时所阐述的大革命意义那样:“自从太阳当空、星辰环绕,还从未发生过人的存在汇聚于其头脑亦即其思想中这样的事情,而人正是在思想的启发下建立了现实世界”(PH 447)。对于黑格尔和其他德国人而言,大革命以理性的制度取代了腐朽过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些德国人(以及不少当今的评论家)认为大革命英勇地巩固了理性的社会政治形式,从而将之视为“现代性”的决定性来临。^② 虽说这些德国思想家和作家不想效仿法国人那种粗暴的现代性建构方式,但他们衷心希望德国能通过缔造自己的现实理性世界来追随大革命。^③

要相信大革命作为现代性之突破的历史效力及其与德国的相关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若是这么来理解大革命,会给德国知识分子带来不可小觑的问题。被视为普遍理性之成就的大革命,提供了一套各地理性国民都有义务遵循的社会政治原则的模式。^④ 可德国是否能够满足这种理性和现代性的标准,还根本不清楚。在德国没有可以

① Vierhaus 8-9.

② 比如参见 M. Rainer Lepsius, *Soziologische Theoreme über die Sozialstruktur der "Moderne" und "Modernisierung"*,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ed. Reinhar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7, p. 12。该观点受到如下文章的间接批评: Rolf Reichhardt,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als Maßstab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Voss, 322-324。

③ Vierhaus 10-12.

④ 大革命的种种理性原则能够与而且实际上也与它们的实现手段分离开来;前者被当作本质性的普遍律令,与其特殊的、“偶然的”或巧合的实现条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参见 Vierhaus 8。

比较的社会和政治变迁。^①拿破仑的征服促成了社会和政治改革,这在普鲁士表现尤其显眼,可那次改革的最终结果暧昧不明,而且随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动。^②

人们那时也不清楚,大革命作为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尺度,对于德国文化而言意味着什么。18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刚刚从所谓法国文化的监管下解放出来。^③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再到唯心主义,德国知识分子逐渐有了自主感和成就感,故而在世纪之交时的不少德国思想家看来,德国当时是精神和理智的特权王国,是地道的诗人和思想家民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799年写道:“纯粹为了艺术和学识的缘故而将艺术和学识奉为神圣的东西,这是只在德国人那里才具有的民族特性。”^④

相信大革命的理性与现代性的那些德国知识分子,是这场智识活动全盛时代的一部分,而且他们都有新的文化自主感和成就感。然而

① Vierhaus 12; and Jürgen Voss, *Vorwort*, in Voss, viii–ix.

② Reinhart Koselleck,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Stuttgart: E. Klett, 1975; Walter Simon, *The Failure of the Prussian Reform Movement*, Ithaca, NY: Cornell UP, 1955.

③ 参见 Madame de Staël, *De L'Allemagn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Didot, 1876, pp. 112–113; Vierhaus 8.

④ 转引自 Friedrich Meineck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3, p. 62, 并参见 45, 55, 148; Droz 183–185, 483–485, 487–488。在《论德国》中,斯塔埃尔夫人尽其所能地固定了新的德国文化认同在欧洲其他国民心中的形象,她反复强调德国人依其本性和传统是不切实际的民族,对抽象钟爱有加;德国是“思想的国度”(11),是“地道的形而上学民族”(363)。亦参见 10, 85, 408, 468, 481, 489。这种新文化认同的建构与19世纪早期的大学改革相辅相成。参见特纳(R. Steven Turner)的如下论文: *The Growth of Professorial Research in Prussia, 1818 to 1848—Causes and Context*,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3, 1972, pp. 137–182; *University Reformers and Professorial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ed. Lawrence Stone, v. 2,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4, pp. 495–531; *The Bildungsbürgertum and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in Prussia, 1770–1830: The Origins of a Class*, *Histoire social/Social History* 8, 1980, pp. 105–136.

世纪之交时德国的文化政治,有可能致使那些知识分子对德国新文化认同的成员资格请求无效。因为反对大革命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们这时主张,德国独一无二的文化——它特有的唯灵主义本性——(往小的方面讲)有别于法国,(往大的方面讲)也有别于社会和政治的现代性。^①与大革命的现代性为伍,就等于自绝于真正的德国唯灵性。那些既支持大革命的原则又想在德国新文化认同中赢得一席之地的知识分子,便需要证明该文化认同能与大革命的本质动因调和起来。他们务必把德国的文化成就囊括进定义现时代意义的等式中。

本文考察如下努力的演化,即把德国新文化认同纳入法国大革命所定义的一般现代性话语。我希望通过关注黑格尔、海涅和马克思的关键作品,来表明这个自始困难的计划如何在19世纪上半叶变得更成问题。从黑格尔到海涅,再从海涅到马克思,对于德国满足现代性新标准的能力越来越忧虑,对于德国文化的造诣越来越怀疑。让德国文化认同与公认的法国大革命现代性联合的计划,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破产了。而随着它的破产,该计划悖理地导致了它最初旨在预防的结论:德国对现代性的抵抗是深层的、倔强的。^②

① Droz 483-487; Staël 85, 408, 465; Vierhaus 14. 德国文化与公认的社会政治现代性之间存在固有的敌对,这一观念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行其道。参见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69。我在本文里讨论针对该趋势的一股逆流,即把德国文化整合进一般现代性话语的努力。有位学者在近作里勾勒了另一股逆流,与我讨论的正相反,他分析了20世纪初期将现代性诸层面(比如技术)整合进有特权的德国文化一般话语的努力,参见 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

② 德国人的这种看法,差不多是德国研究的老生常谈了。有本著作最近挑战了这一看法,参见 Geoffrey Eley and David Blackbourn,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P, 1984。本文的一大目标就是去理解19世纪的德国人本身如何以及为何开始接纳埃利和布莱克本所说的一种成问题的德国史概念化。我希望本文会表明,这样一种理论选择绝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经验上无证自明的,而是历史大势的产物,是为免除焦虑对不同理论和文化设想的掌控。

黑格尔：让法国与德国联合起来

黑格尔 19 世纪 20 年代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时提到，正是“绝对意志”原则构成了社会平等和代议制立宪政府的这两项大革命成果的基础和力量来源。黑格尔说绝对意志是纯形式性的；其运行不以特殊个体或社会关怀为转移（PH 442）。它不受制于先前的欲望、利益、道德、宗教、历史或政治，一味追求完全的自主性。而且在谋求自身从一切既定制约中获得解放的时候，该意志渴望达到抽象的普遍性。无拘无束的意求成为一条一般原则，这是它的愿望（PH 442-443）。黑格尔的主张是，无论是大革命的成就，还是它后来沦为恐怖、专政以及持续的政局动荡，都源自这种抽象的普遍化意志（PH 450-453）。

绝对意志原则以法国大革命的形式波澜壮阔地登上历史舞台。但黑格尔认为这种发展并不是法国人特有的东西；绝对意志的原则不由某个特殊民族独占。相反，它界定了更为宽泛的条件，一套一般化的当前情势——黑格尔称之为“最后的历史阶段，亦即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PH 442）。换言之，绝对意志必定也在德国得到实现。

但黑格尔承认，德国尚未出现符合绝对意志的类似政治变动亦即等效政治改造（PH 443）。为了将德国纳入绝对意志原则的统辖范围，黑格尔便在其认为与法国大革命之政治发展等效的德国发展中寻求绝对意志的表现。换言之，黑格尔借助一种特定的解释策略，在不同形式的现象之间建立同质性或谋划比附关系。该策略假定同质的或相仿的形式必然表达同样的原则或本质。

黑格尔观察到，抽象的普遍化意志在法国以大革命的形式呈现出一种“实践效果”。但在德国，绝对意志体现为不同的外观，体现为“单纯的宁静理论的形式”（PH 443）。黑格尔更进一步主张，绝对意志在“康德哲学”那里“获得思辨的承认”（PH 443）；康德为德国实现的东

西,正是大革命在法国所完成的東西。^①

黑格尔通过断言哲学形式与政治形式之间的同质性,让德国与法国大革命联合起来:德国人在“理论抽象”中完成的东西,正是法国人在实践中完成的东西(PH 444)。黑格尔通过在德国理论与法国政治之间建立这种比附关系,隐含地为德国争取了对现代性的参与。德国人的思维与法国人的政治就先进程度而言不相上下。这样一来黑格尔就确立起来一种德国现代性的尺度,但正如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以有关当前情势的统一愿景打通德国与法国大革命的尝试,立即带来进一步的迫切问题:“……为何着手实现[绝对意志原则]的单单是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PH 443)。

为什么是法国而非德国承担绝对意志的实际兑现?为了回答这项疑问,黑格尔诉诸宗教改革,它被许多德国知识分子视为德国特定唯灵主义特征的源头。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路德使德国意识超脱于外部权威,而促使它自立自强。自路德以来,德国思想被描绘为越来越注重省思和灵魂的内心生活,亦即内在性的持久深化。黑格尔声称,这种德国特有的强健的内在性特征,是德国接受现代性的条件。在他看来德国正是由于宗教改革,才发展出一种广阔而稳固的唯灵性,一种内心生活,从而能够吸纳绝对意志的发挥(PH 444,449)。因此,德国启蒙运动中绝对意志的第一番表达完全能够与宗教相融,其实是“依神学而运行”的(PH 444)。然而法国欠缺一次宗教改革,导致其唯灵性是孱弱的、零碎的。因此,绝对意志在启蒙运动中现身的时候,便与天主教会发生了激烈的外部冲突。法国人从未确立一般的、谐和的唯灵性;意志沿着斗争政治的逻辑运转(PH 444,449)。与德国的情况不同,法国不存在慰藉人心且包罗万象的内在性,无法将纯粹意志对社会制度的敌对转为思想内部的敌对。

① 对黑格尔来说,绝对意志的理念既处于康德认识论(指它的先验自我观)的中心,也处于康德伦理学(指它的毫不妥协的善良意志观)的中心。参见 PH 343。